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 张培刚

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

张培刚 廖丹清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张培刚

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

张培刚 廖丹清 著

中国经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张培刚 廖丹清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ISBN 7-5609-2844-7

I. 二...

II. ①张... ②廖...

III. 粮食作物-作物经济-研究-中国-二十世纪

IV. F326.11

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

张培刚 廖丹清 著

责任编辑:陈培斌
责任校对:吴 晗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

插页:2

字数:516 000

版次:2002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609-2844-7/F·237

定价:3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内容涉及一个世纪、其写作时间从启笔到全部脱稿逾越六十余年的历史性经济论著。作者基于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对中国粮食问题长期的广泛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全面分析和探讨了该世纪中国粮食的生产、消费、运销和进出口的情况,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从未有过的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粮食经济的力作。

全书分为五篇,共二十一章。首篇总论阐述了粮食问题的涵义和研究方法,粮食问题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粮食自给程度估计方法的评述;接着两篇比较详尽地分析和研究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粮食经济;最后两篇则概括地阐述和讨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粮食经济。本书前三篇的研究,既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后两篇则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粮食经济的特点和问题,同时也展望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的发展前景。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总序

“发展经济学”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等,都可以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这里的“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扶持和协调发展。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条件下,研究农业国家如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已经存在少数先进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后进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其有利的条件,亦有其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条件是,当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时,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可资借鉴,有先进的技术和巨额的资金可供利用。不利的方面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过去的宗主国,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则大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即使到了今天,在相互的交往中,前者依然习惯于以主人或强者的身份自居,他们尽管承认后者在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则仍然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地。纵然前者确实是想以平等

的身份对待后者,但由于诸般原因和经济上的优劣之势相差甚巨,因而在国际交往中,后者亦难免亏多益少。加上有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人口负担过重,或者社会历史束缚过多,或者政治限制过紧,以致难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崛起。这些都是狭义发展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发展经济学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此观之,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前途大有可为。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国外一些学者却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持有不同程度的悲观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以后,到 70~80 年代,“已经在走下坡路”,由高潮转入低潮,进入所谓的“收益递减阶段”(参见 G. 拉尼斯:《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4 页);甚至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或快要“死亡”了。这些看法当然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原因。毋庸讳言,发展经济学在 80 年代以后确实不像 50~60 年代那么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整体来说,也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然而,正如上面所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发展经济学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前途正不可限量。那么,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出路究竟何在?一些学者提出今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到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讲求实际的,并且使人颇受启发,具有某些革新意义,但仅仅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处的困境。

基于这种考虑,1988 年 10 月在青岛会议上,我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当前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这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仅以第三世界中采行市场经济即采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把第三世界中实行计划经济或采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发展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前者,更要研究后者,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问题,研究它们在转型中的发展或发展中的转型问题,这样就较大地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范围,丰富了其内容。

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更要以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巴西等)为重点,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全面而又综合深入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策。这也就需要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也才能真正摆脱发展经济学目前所处的困境。

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西欧、日本等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差异,借鉴西欧、日本当时促进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这就需要深入剖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制度原因和现实制约因素,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全国各地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实践,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于199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扩大版)。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我们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实践。在这之后,我们又组织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青年教师,结合博士论文的写作,分别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以专题形式,继续进行探讨和深入剖析。现在,陆续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所进行的艰苦探索的成果,其中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等都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我本人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继续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问题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中国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巨变所引发的经济进步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考察。随着研究工作的向前推进,本单位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有所助益。当然,这些作品都是属于探索性质的,一定有不少欠缺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张培刚

1999年5月于华中理工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序 言

再过数日,我们将送别二十世纪,迎来二十一世纪。当此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和廖丹清同志特地将我们前后合作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一书出版问世,就教于经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变乱层出不穷而又充满激情和革新的世纪。在这一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大国及其解体后的新俄罗斯等国;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成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还出现了众多的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横跨亚、非、拉美三大洲的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世纪,更出现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原子弹爆炸、核能源的和平利用,特别是出现了电脑和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迅速而又广泛的传播和使用。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必将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维观念,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但不论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事业如何进步,吃饭问题仍将是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将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书就是研究和讨论我们国家的吃饭问题,书名题为《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全书五十余万言,时跨一个世纪。开卷之前,有几个问题和情况,须向读者作一简要说明。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标题为何冠以“二十世纪”?

书中行文虽未系统地从世纪之初论述到世纪之末,但在有些问题的探讨中曾上溯到前清末年,也就是十九世纪之末或二十世纪初。例如,讨论我国米谷之进口贸易,洋米入口始于何时这一

问题,引用了“自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年)清圣祖命输入暹罗(泰国)米三十万担,运到广东、福建、宁波贩卖,此为前清输入洋米之始。自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起,进口洋米数量骤增。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及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进口洋米 1,000 万担以上。至民国,其初渐次推进,民国五年(公元 1916 年)达 1,100 万担,旋复低落,到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降为 110 万担。然至民国十年(公元 1921 年)进口洋米又一跃而为 1,000 万担”。书中还有一些地方,亦有同样的引用数字资料,在此恕不赘述。

其次,也是主要地,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来龙去脉和撰写历程。

我和本书副主撰廖丹清同志,都先后出生于农村(我比丹清年长 20 余岁);少年时期都从事过砍柴、放牛、插秧、割谷等农活,深知并亲身感受过农业生产活动之辛劳和农民吃饭问题之艰难。从幼小时起,直到今天,我们都对农民怀有诚挚的深厚的感念之情。当我们各自成长到青年时期参加工作时,又都先后与农业经济专业的教学和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有一段时期,我们都先后专门地广泛而又深入细致地从事过我国粮食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并撰写和出版过这方面的若干专著和多篇论文。

在本书五篇中,第一篇至第三篇乃我本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所撰写;第四篇至第五篇则为廖丹清同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撰写。

就我本人而言,1934 年暑期,我刚满 21 岁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当即按一年前预约选定,到北京(当时称北平)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著名学者陶孟和所长的指导下,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

当时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整理该研究所在 1930 年,由陈翰笙、王寅生、韩德章、钱俊瑞、张稼夫、张锡昌诸位先生主持,所进行的规模比较庞大的“清苑(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并写出研究报告。该项调查资料涉及 1,500 余户农家,一户一册资

料,堆聚了半个小房间,调查内容丰富细致,在国内确属不可多见。只是一来我生长在南方,刚出大学门,对北方农村情况和农民生活,尚不熟悉;二来此项调查是五年前进行的,对可能的变化情况,亦不清楚。幸好有老同事韩德章兄(后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曾参加过当年此项调查,而且他是大学农艺系毕业的,在北方和南方进行过农作物和农村经济调查。为此,经所长同意,在德章兄的指教和协助下,我们两人一起,于1934年冬专程到保定城区和清苑四邻乡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补充调查。紧接着回北平后经过几位青年同事的协助计算和我本人的撰写工作,乃于1935年底完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研究报告,于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在我国农家经济中,一般而言80%以上的农作物是粮食作物,所以通过对清苑(保定)的农家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也就使我开始了解到我国北方地区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情况及其特点。

第二个较大的工作任务,就是1936年夏,因日军入侵,华北局势日益紧迫;研究所早已于年前迁至南京,这时,受资源委员会之委托,特命老友张之毅兄和我带领数人赴浙江举行全省食粮运销调查。着重之点凡三:(1)搜集全省各区之食粮移动数字;(2)在重要市场设立运粮情况报告制度;(3)详查食粮的运销机构。前二点乃应资源委员会之要求,后一点则循本所学术研究之需要。此外,并搜集各市场历年的食粮价格(包括乡村价格、批发价格及零售价格);又选取重要粮食区域,举行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费用调查,以求种植粮食作物与非粮食作物之比较利得。调查范围颇为广泛。

浙江全省粮食调查工作,除之毅兄和我二人担任外,还有研究所张铁铮先生协助。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到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梁庆椿教授的大力支持,特派毕业班两位本省籍同学许超、叶德盛两君参加;由于江、浙地方口音难懂,因而他俩兼管调查和口译,对工作的顺利进行,帮助良多。6月,我们这一行人在杭州会合,然后兵分浙西和浙东两路,分赴各市镇商店进行访问和调查。此次总计调查区域遍及32个县、市的56个市场,而于杭州市之湖

墅,浙江之硖石、湖州、泗安,浙东之宁波、绍兴、温州,浙中之兰溪、金华等市场,尤为注重。调查时间自6月下旬至9月中旬止,共约三个月。

回南京后,因资源委员会急待参考浙江省食粮移动数字,故先将这一部分资料提前整理应命,费时两月。直至1937年初,我们开始撰写浙江食粮运销的研究报告。稿未竟而“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略华北;紧接着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发生,南京时遭空袭,研究所计议迁往湖南长沙,撰写工作陷于停顿。不盈月,之毅兄因任教陕西国立西北农专,我本人则因桂省约往研究和设计该省战时粮食方策,先后请假离所,本书之编写,乃不得不暂行搁置。至1938年,研究所由湘迁桂省阳朔;9月,我销假回所,认为此次调查所费心力甚多,且材料至为丰富,不忍将全部工作,遽而中辍,遂着手继续撰写。是年底,稿将完成时,研究所因华南战事再度吃紧,又拟从桂省迁至云南昆明,我为了免于一再延展起见,特在起程前,抓紧时间将全部脱稿,成为《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三个也是较大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从事广西粮食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正如上面提到的,当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日战事爆发,南京时遭空袭,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乃又计议西迁。趁此时机,我遂向研究所请假一年,应允老友千家驹兄(原系研究所老同事,当时任广西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兼任新成立的该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之邀约,赴桂林担任该室研究员,从事广西粮食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并设计战时广西粮食问题之管制方案。当时一同任职的,还有主管广西交通问题研究的陈晖兄(惜英年早逝),及主管统计、绘图和资料整理的徐坚兄(解放后,曾从德文原文再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广西省府各所及统计室,甚为重视经济调查和统计数字,除已出版的《广西年鉴》外,还作了一些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我们还和省统计室密切合作,在张俊民主任、刘炳燊专员、黄华庭专员的热诚协助下,我们又进行

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调查。至1938年暑期,经过了大半年的忙碌时间,我写成《广西粮食问题》一书,当即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与中国粮食经济的调查研究有关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设在南京的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按期在全国刊行的《农情报告》及其主持人员。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对于有关全国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的数字,因未作全国普查,故向付阙如。一般只有零星调查或全国性的数字估计,因而从事研究工作,深感不便。该实验所农业经济科负责人汤惠荪教授和具体主持人杜修昌先生,有鉴于此,特在全国各县城或乡镇,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点,委托一位统计员,每年按季节向实验所报告该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后来又扩展包括家畜家禽,称为《农情报告》。从此,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较为方便,颇感助益。1936年春,社科所迁南京后,我便特地到中山陵附近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拜访汤惠荪先生和杜修昌兄,大家谈起做调查研究工作之甘苦,颇有一见如故之感。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又与修昌兄往来数次,“八·一三”全面抗日战事起,我们两单位乃各自西迁,青年时之相交自后亦劳燕分飞,惜无再见之缘。

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几年来,从以上数次对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的系统调查研究中,作为一个青年学子,已经获得了几点重要认识:

(1)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嫌过于笼统。实则南人中小贫困家庭,除少量米谷外,食用麦、薯(红苕)、杂粮、豆类、瓜菜所占比重大;而北人贫苦家庭除少量小麦外,食用杂粮,特别是玉蜀黍(包谷)、粟米、高粱、豆类、瓜菜等,所占比重大。

(2)不能由于有些年份米粮进口甚多,就认定我国粮食不能自给。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我国洋米进口,特别是沿海上海、宁波两市,大量输入安南(后称越南)的西贡米,缅甸的仰光米,为数甚巨,有些年竟占据海关进口首位。为此,国人常叹:“我国以农立国,而粮食竟不能自给,不亦悲乎!”这样的人士,充满了爱国之

心,所发肺腑之言,实堪钦佩。但当年我们经过了几番粮食调查(特别是浙江省食粮运销之调查)便认识到:洋米之大宗进口,并非由于我国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而是由于:第一,当时海关主管权掌握在洋人手里,洋米进口收税甚微,且手续极为便利;第二,国内交通不便,沿途关卡重重,运费及关卡费用层层加码,致使内地湖南、四川多余米粮,运至上海、宁波,所费昂贵,竞争不过洋米。当年,国人眼睁睁望着上海、宁波米粮市场为洋米所独占,亦只有徒唤奈何!

(3)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是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他们的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从上述几种我在农村和乡镇所进行的调查,我发现并认识到,一方面,当农民向城镇粮行出售小额稻谷、小麦、杂粮或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粮食作物或油料作物时,这种市场主要由粮商垄断,农民只有出售与否之微小选择权(在大多数场合,由于情势所逼,亦不得不贱价出售),而无讨价还价之力。另一方面,农民所需用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农具等,这种市场,同样亦主要为城镇另一批商人所垄断。这种对农民双重不利的情况,使我印象深刻,经常为农民叫屈。迨后四十年代初,我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至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我在读了一两年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又特地选读了“垄断竞争理论”创始人张伯伦(E. H. Chamberlin)教授的“垄断竞争理论”研讨课和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约翰·D·布莱克(John D. Black)教授的“农业经济政策”研讨课。在课堂讨论时,不少洋人同学发言,而且大都从新近出版的书刊上引经据典地说:完全竞争的情况,现在大城市里和大工业里已经很少看到;倒是在农业和乡村市场上,由于农民人数多,且又分散,因而他们对出售的价格和产量难以控制,所以完全竞争还是存在。我当时几次三番,用我在上述调查研所得到的资料情况加以说明和辩解;并指出:农民参入市场人数多,只说明农民这一方难以形成垄断力量,而另一方粮商或农业生产资料商,在小城镇只有三两家,甚至一家,易于形成垄

断,正好用张伯伦教授讲授的独家垄断理论或寡头垄断理论来解说。同学们听后,先是愕然,继而觉得很新鲜,最后感到很有说服力。当场张伯伦教授和布莱克教授也都各自分别在自己的讨论课堂上,频频点头称是。越一年,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第二章第四节“农民作为买者与卖者”,便把我的这一不同于当时一般外国学者的重要而又新颖的观点,写进了文稿里。

(4)通过上述几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广西粮食问题的调查研究,我当年初步认识到并提出了食粮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理论。首先一个方面是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与人口定居的方式之间的区位化关系。在农业国家或经济比较落后而工业化尚未开始进行的国家,人口的分布主要是由粮食的生产所决定的。在研究上述关于广西粮食经济结构的特点时,我曾和当时的同事徐坚兄一起讨论,并由徐兄以精细的手笔绘制成两图,以表明稻谷种植的分布情形和人口定居的分布情况,从而发现了两图完全符合,进而悟出了粮食生产分布决定人口定居分布的区位化关系。其次一个方面,是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与粮食加工工业及有关手工艺如碾米、磨麦(面粉厂)、酿酒、榨油、打豆腐等手工业和作坊的区位化关系。前者不仅可以决定后者的区位,而且还可以决定后者的形态和活动。

1943年,我到哈佛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三年,在师从经济史学大师厄谢尔(A. P. Usher)教授读完了“欧洲经济史”课程之后,又读到他刚刚出刊的《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的动态分析》打印本,使我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入一层的体会。我认识到,这种区位理论的动态方法,能指出各个历史阶段基本区位因素的变迁,而这种基本区位因素正是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例如新的动态方法就曾发现,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以食粮(Food)为主的区位形态演变为以煤(Coal)为主的区位形态。至于变迁的原因,则是普遍应用现代动力于工业上的缘故。这样,我更加理解到,以食粮作为主要区位因素,乃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开始以前的一个普遍特征。

(5)通过以上数年的农村经济调查,我还认识到一个根本情况,那就是我国农民家庭每年的辛勤劳动所得,一般抵不上缴纳地租和缴纳政府捐税的负担数额。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我曾用调查研究所得的资料,写成“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一文(载于《东方杂志》1936年新年特大号),大声疾呼社会人士和政府当局,重视农民生活日益困苦的问题。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一般均有改善;特别是近二十年实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又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少的农民家庭开始富裕起来。但就全国而言,农业生产进步迟缓,农民生活进一步提高亦相当困难。农民的捐、税、费负担,名目繁多,大有不堪重荷之苦。最近政府有鉴于此,已开始着手大力整顿,锐意改革,可望早日取得初步成效。

在经过上述几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形成了上述几点基本认识的同时,我还特地搜集了一批有关粮食经济问题的中外书刊资料,总盼望有朝一日我能有机遇写出一部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际资料分析的关于中国粮食经济问题的书刊。谁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事关我终生研究大方向的插曲。

1940年春,1、2月间,这时研究所已由广西阳朔迁至云南昆明一年有余,从昆明最高学府里传出了一个激动青年学子的消息: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第五届将于本年8月分别在昆明和重庆两地同时举行,共招收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一名),每一个科目一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门类,而文科只有两名,计经济史一名,工商管理一名。我当时认为这是难得一次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值得努力争取,遂决定报考“工商管理”门。据招考简章,除英语外,该科须考五门专业课程:即经济学、货币与银行、劳动经济、成本会计、工商组织与管理。当时我已离开大学课堂六年,在研究所里主要是从事农业和农村问题,特别是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运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现在如要参加考试,对这几门重头课就必须重新下一番扎实苦功进行准备。于是我向研究

所请了长假,除本所图书馆外,并托友人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国内知名教授有关上述各专业课程的专著、教材或杂志论文,共计近二百册:一方面有选择性地通读;另一方面择其重要者精读,摘录作笔记。八月在昆明云南大学一大教室内笔试。英语和五门专业课,连考三天,总监考教师是西南联大教务长、有名的独脚教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我记得英语是一个上午只考一篇作文;五门专业课考试题我只记得“劳动经济”考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此题我答得较好,这要归功于陈达教授的《劳工问题》一书。

考试完毕,我将何往?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1940 年夏秋间,半年前与我同时离开研究所的挚友张之毅兄,曾暂时和我一同寄寓于昆明邻近乡村一旅社,我专心看书摘记,准备清华庚款留美考试;之毅兄则专心构思运笔,撰写《农产运销学》一书,一月前他已稿成去渝(重庆),转往陕西武功“西北农专”任教。之毅兄走后,我迁居于昆明城区另一挚友万先法兄处,住膳一起,备考应试,均极称便。

先法兄与我年龄相若,志趣相投,武汉市人,家居汉口,数年前毕业于武昌县华林、华中大学(前身为教会举办的文华大学,老校长为著名哲学家韦卓民教授)中文系,但他英文功底极厚,且喜读社会科学专业书刊。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初识于武汉,结伴同行到桂林,一年前又偶遇于昆明街头行人道。那是 1939 年秋冬间,有一日我正在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昆明临时所址竹安巷 4 号附近行走,忽遇先法兄路过,两人一见,真是“他乡遇故知”,均大喜过望。先法兄当即带我到附近的铁局巷 13 号,即他的办公地点——华中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兼住所。原来不久前先法兄已应母校之约,携眷自桂林来昆明,改任现职,主持办事处,负责华西大学西迁大理喜洲镇临时新校址关于图书仪器设备之转运事宜。越数月,夏去秋来,我考完后,真感到半载紧张,一身轻快,正好与先法兄作伴于办事处;虽然有日机警报,但我们在避机空隙,仍然上天下地,说古道今,友情与学益日浓。